

商都钟鼓

大出息·中出息·小出息

陈鲁民

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回忆说,父亲的愿望始终都是让百姓富裕、国家强盛,无论何时都是如此,并且经常教育孩子们要为国家做贡献,“没有大出息,也要有‘中出息’和‘小出息’。”(8月16日中国新闻网)

天下父母无不盼望子女有大出息,小平同志自然也不例外。但他通晓事理,睿智达观,知道凡事不可强求,不是你望子成龙他就能一飞冲天,你望女成凤她就能栖高枝,所以,尽管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都成大器,有大出息,但还是很务实地鼓励孩子各尽所能,有多大劲使多大劲,能飞多高就飞多高,无论如何不能“没出息”。

所谓“大出息”,就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大贡献,干出了大事业、大成就,在国内外有大影响。这个“大出息”,固然需要自己有远大志向,不凡抱负,也需要有雄才大略,过人才具,还需要得天独厚,机遇青睐,少了哪一条也不行。所以,古往今来,立志做大事、有大出息的人车载斗量,不计其数,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。一个时代,也就那么三四十人最多百余人吧。政治家邓小平三起三落,开创改革开放新纪元,把人民带入新时代,

肯定是“大出息”。科学家袁隆平,以毕生努力试验杂交水稻,增产稻谷数千亿斤,人称杂交水稻之父,也是“大出息”。企业家李嘉诚,白手起家,宵衣旰食,创下价值千亿元的财富,多年蝉联华人首富,且不遗余力支持国家经济建设,热心慈善事业,也可跻身“大出息”行列。还有京剧大师梅兰芳、美术巨匠徐悲鸿、学术泰斗钱锺书、著名作家莫言等,都在“大出息”榜上有名。

所谓“中出息”,依我管见,做科研要成为该行业的学术带头人,业内人提起来是如雷贯耳,譬如那些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;演电影要成为一线明星,一露面就是“男一号”、“女一号”,不是“影后”,就是“影帝”,就像“国际章”、“葛大爷”们;写小说要能拿茅奖、鲁奖,作协里不是主席就是副主席;居官过去至少是州县现在得厅局级,屁股后头要“冒烟”,这一条可能有些俗,但总要有些具体的衡量指标才好拿捏。“中出息”者,要承上启下,支撑局面,要统领一方,牵头挂帅,也颇重要且不易。

所谓“小出息”,大概就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,多如恒河之沙,平凡如路旁小草。他们兢兢

业业地工作,本本分分地生活,凭技艺立身,靠良心干活,本事不大,能耐有限,但决不自轻自贱,也不混日子,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辛勤耕耘,收多了笑两声,收少了叹口气。久而久之,居然也小有成就,小有名气,爬格子爬成了小作家,打工打成了小老板,办事员熬成了小头头,小学徒成了老师傅,小医助成了“一把刀”,群众演员最后成了男配角、女配角……他们学有专长,术有专攻,内可养家糊口,小有得意,外可奉献社会,无愧天地。

揆情度理,国家社会需要“大出息”的人,他们是中流砥柱,泰山北斗,旨在引领方向,责为力挽狂澜,“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”;同样也需要“中出息”的人,他们是大厦的四梁八柱,是单位和行业的主心骨、领路人,可保一地平安,造福一方百姓;“小出息”的人则如同华屋之一砖一石,园林之一草一木,看似不起眼,却都各司其职,少了谁都不行。“大出息”者朝乾夕惕,纵横捭阖;“中出息”者废寝忘食,守土有责;“小出息”者不厌琐碎,默默耕耘,三者若能有机结合,并行不悖,乃为民族之幸,盛世之兆。

散文

老派的吃喝

王太生

汤包的吃法,据梁实秋说,“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,抓住包子的皱褶处猛然提起,包子皮骤然下坠,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,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己的碟中,轻轻咬破包子皮。”

老派的吃喝,是闲情与古典的。吃泥螺,用牙齿稳住泥螺,然后直对舌头,用气轻轻一吸,舌尖一舐,泥螺肉被剔出,泥沙留在壳中。那种吃法,与河里的螺蛳大抵相似。小时候,我做客苏北沿海的乡下,常有小木船从村庄旁的一条大河漂过,船上卖些从海边运来的新鲜泥螺,一种小海鲜,那时吃泥螺,吃的速度很慢,吃势也很老派。

老派的吃喝,有一种奔跑的姿势与态度。臭豆腐干,是张爱玲喜欢的小吃之一,她曾描述自己追着买臭豆腐干的滑稽情形:“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,便抓起一只碗来,噔噔奔下六层楼梯,跟踪前往,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,买到了之后,再乘电梯上来。”

老派的吃喝是一种文艺范。我的邻居,蹬三轮的张二爹,夏天喜欢用腊肠炖鸡蛋。老头儿捏着小盅酒,一边喝,一边哼哼唧唧唱京戏。腊味,小人物的烟火苍生萃取,把日子过成一段段,有滋有味,有形有色的情调,像小说、戏曲、书法、绘画一样,表达和升华,渗透到朴质的居家生活。

在我的印象,推崇的老派吃喝,应该红泥锅灶煮花藕。那口黑乎乎的大铁锅,浑圆而硕大,锅里码着柴条的藕,再盖上严实的木锅盖,用柴火旺火大煮,文火慢炖,经过悠长缓慢的煮,藕香四溢。春天,我去水乡看会船,在村子的一角有人在卖大乡看会花藕,见那裹着花头巾的农妇,用刀切一段段的熟花藕,软若豆腐。

当然,老派的人,喝茶也很讲究。他当然不会去喝那些瓶装矿泉水、纯净水,或者碳酸饮料。他们喜好天水泡茶,《浮生六记》里,芸娘在“夏月荷花初开时,以纱撮茶叶少许置花心,天明取出,以泉水泡饮,香韵尤绝。”饮露水茶,不仅是一种选择,还有一种从自然提取日月精华的智慧。

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提到煮鸡粥:“肥母鸡一只,用刀将两脯肉去皮细切,或用刨刀亦可;只可刮削,不可斩,斩之便不腻矣。再用凉鸡熬汤下之。吃时加细米粉、火腿屑、松子肉,共敲碎放汤内。起锅时放葱、姜、烧鸡油,或去渣,或存渣,仅可。宜于老人。大概有些费事,现在人照此法炮制的不多。”

老派的吃喝,是气定神闲的全身心满足投入,那份精气神,心无旁骛,相对于快餐年代的潦草、仓促,追求一份唯美、精致。

老派的吃喝,也是一种音乐。古典主义的大提琴和小提琴、琵琶与古筝,沉浸在一种悠扬舒缓的节奏。

所以,梁实秋的技艺、张爱玲的态度、芸娘的精致、袁枚的烦琐……构成老派吃喝的做派、风格和肢体语言。

正像台湾作家简媜在《肉欲厨房》里说,“坐在餐桌前,细致地品尝每一道菜的滋味,用嘴唇测温,放入嘴里,咀嚼,吞咽,感受食物滑入体内,沿着食道进入胃所引起的那股电流。”这位性情女作家,完全熟悉胃部蠕动的节奏,在味蕾贪婪的时候,甚至觉得“自己的胃不仅安了磨豆机,而且还还了齿轮。”

老派的吃喝,是一种流派和风格,它不会因时间的新鲜而消失。

博古斋

古代的家训诗

王东峰

家训,是父母对子孙立身处世、持家治业的教诲,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个人的修身、齐家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中国古代家训以散文为主,也有少量是诗歌的形式,通俗精练,意味深远。

五代时期的范质,以廉洁自持,其侄儿要求范质帮他调升官职,范质就写下了《诫儿侄八百字》一诗,对他进行批评教育。范质在诗中提出了“六诫”,又从交友、义气、节俭、饮酒等方面指出应该注意之处。“诫尔学立身,莫若先孝悌,怡怡奉亲长,不敢生骄易。……诫尔学干禄,莫若勤道艺。……诫尔远耻辱,恭则近乎礼。自卑而尊人,先彼而后己。……诫尔勿旷放,旷放非端士。……诫尔勿嗜酒,狂药非佳味,能移谨厚性,化为凶险类。……诫尔勿多言,多言众所忌。”

北宋诗人张耒的邻居中有一个卖烧饼的少年,每天天不亮,就沿街叫卖烧饼,无论寒暑雨晴,天天如此。张耒内心感触颇深,于是就给两个儿子张矩、张结写下《示稚孙》一诗:“城头月落霜如雪,楼头五更声欲绝。捧盘出户歌一声,市楼东西人未行。北风吹衣里我饼,不忧衣单忧饼冷。业无高卑志当坚,男儿有求安得闲。”张耒告诫儿子:人生于世,从事的职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,但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。男子汉要自食其力,不能做游手好闲的懒汉!

南宋诗人陆游次子陆子龙赴任吉州(今江西吉安)司理参军(掌管司法审判的官员)时,陆游写了《送子龙赴吉州掾》的送行诗:“汝为吉州吏,但饮吉州水;一钱亦分明,谁能肆谗毁?……益公名位重,凛若乔岳峙;汝以通家故,或许望燕几。得见已足矣,切勿有所自。”陆游此诗告诫儿子:审理司法案件时要明察详审,秉公而断;居官要尽职尽责,清廉自守,一文钱也不可私取;不要利用前辈的名望为自己“开后门”,谋取加官晋爵的好处。

明代文学家、思想家吕坤,写有《望江南·示儿》:“贫贱易,富贵良独难。一分有利一分害,半生不足半生安。无私心自宽。”吕坤在这首短诗中,告诫儿子要安贫乐道,无私坦荡,这样才能心安理得。

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,被充军去伊犁,途经西安时,口占一首留别家人:“力微任重久神疲,再竭衰庸定不支。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?”林则徐在诗中表明了在禁烟抗英问题上,不顾个人安危的态度,虽遭革职充军也无悔意。个人性命无关紧要,只要对国家有利,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,绝不会因为可能受到祸害而躲开。

上述这些家训诗,无不流露出父母望子成龙的舐犊深情,表现了古人要把道德修养、人格风范留给子孙,告诫他们要清正立身的传统美德。

随着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”日渐老去,是起用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,还是将职业经理人纳入发展大计之中?中国民营企业遭遇的接班危机日益凸显。对于“富二代”而言,是躺在金山银山之中挥霍沉沦,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创辉煌?是在父辈开创的阳关道上大踏步地行走,还是在自己理想的独木桥上踟躇前行?一个被人称为“富二代”的接班故事,就此展开。

本书是国内首部展现和解析“富二代接班”

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北的河东山下,有一道天然大石崖,这道石崖的石壁面平整,少凸凹无断裂,长有30米,高约40米,巍峨壮观。紧挨石崖下是村民耕种的田地,有一亩多,田地下面就是河道;石崖后上方是一个天然大溶洞,当地人叫它“织机洞”,据说是先人居住生活过的地方。

织机洞的故事别人已经说过,这里只说这面大石崖壁上的石窟。在石壁中间距地面约一米高的石崖上,有一个高约1.5米、宽有1.3米、深有1.4米的人工拱形石窟,石窟口为方形,外小内阔,留有约10厘米深的龛檐壁柱,内壁正面临石人群像(石像有被后人损坏痕迹)。石窟旁边的石壁上刻有《北齐石窟造像》碑文:“北齐天统十年(568年)建造。内刻造像七尊,居中为阿弥陀佛赤脚立于莲花之上,座下两童子。旁雕阿难、迦叶二弟子和文殊、普贤二菩萨像。菩萨前刻青

最高的温度,也就在10~13摄氏度左右。

但是,事情不是这样简单,炉子灭了的事情经常发生。

使用蜂窝煤,最担心的是一氧化碳中毒,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“煤气中毒”。

每到送煤的师傅给各家各户送煤的时候,大家都会很客气地倒茶送烟,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自家送一些干的蜂窝煤,因为刚做出来的煤很湿,很不好点,而且还容易产生煤气(一氧化碳),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对送煤的师傅都很客气。当然,街坊们也都体谅那些送煤师傅,一车煤几百斤重,一个人又要拉又要搬的,要是赶上几个院子深的就更累了,搬完煤往往是深秋的天气,却出了一身的透汗。挣的是什么,却出了什么,大家能送点什么也就送点什么了。

一般这蜂窝煤被送到家之后还需要在院子里面吹上几天,直到差不多干透了才会全家总动员,一起搬到自家盖的小煤池或者窗台底下,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塑料布并压上几块砖或者瓦什么

的,才算大功告成。因为这一冬天就靠这些煤了。谁也不希望下雨的时候给淋湿了。

一些会过日子的家庭会把煤炭买回来自己动手做蜂窝煤。不仅保证了亲自挑选的原料煤不掺假,还能省不少钱。做蜂窝煤的机器,是一个长一米左右的手提铁架子,下面焊着一个蜂窝煤模子,将煤炭装进模子,用脚踏模子上面的盖子往下踏紧,然后一个成型的蜂窝煤就会从模子下掉出来,落在地上。当一排排、一行行蜂窝煤站成一个方阵,一家人咧着嘴笑了。此时,唯愿老天保佑,两三天别下雨,把蜂窝煤晾晒得干干的。

1965年11月,第一座供应民用液化石油气的灌瓶站在北京西郊建成,并率先向北京一些居民区域发展用户。据有人回忆,当时一罐煤气是2.7元,议价是每罐3.2元。

新书架

《接班》

张宁

这个热门话题的长篇小说。故事的主角李佑铭是鹏城李氏集团董事长、亿万富翁李振前的独苗,面对职场上的钩心斗角,商海里的尔虞我诈,他从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“富二代”,在父亲去

世、企业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,携手草根阶层的新一代职业经理人共同崛起,重铸民企辉煌。

事实上,除了财富与权杖,奋斗精神与社会责任的传承才是《接班》的核心所在。

郑州地理

北齐石窟造像

马清贤

狮白象,两边刻二力士,背上有莲花化生。神态生动逼真。”这个碑文是近代拓刻的,因为最后还有一句“1987年5月6日被荥阳县人民政府公布为荥阳县第一批文物。”

原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荆三林在《浮戏山从考》(1988年出版)一书中说:“王宗店人口处东面山崖间,有北齐天统四年伏波将军宋世景造石窟像一处,窟上有铭记,详记造像经过。事见《北史·宋隐传》,《宋世景》为伏波将军,行荥阳太守。时郑氏豪横,号为难治。济州刺史郑尚弟远

庆,先为苑陵令。多所受纳,百姓患之。而世景下车,召而戒之,远庆行意自若,世景绳之以法”。宋世景以此欲筹建一大规模的石窟寺院,凿成一小窟,齐亡。因此寺院未成……”

听当地村民传说,此石窟应该是当时百姓为铭记宋隐(字:世景)刚正不阿,为民除害,对他歌功颂德所建,时任荥阳太守的宋世景也大力支持,建议建造成石窟寺院。结果,刚刚凿成一个石窟,北齐灭亡,新的统治者不允许百姓为已亡朝廷官宦立碑建祠而搁浅。

连载



录了上海人结婚服饰的变迁: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新人衣着如平常穿戴一样朴素,还流行“四个一工程”,也就是备一张双人床、一只热水瓶、一个脸盆、一个痰盂就可以结婚了。

一位1965年结婚的女同志回忆,当年结婚的时候,男方来我家提亲,聘金是4元,聘礼是2斤

糖。婚事确定下来后,结婚那天就由丈夫骑着单车到我家来载我,我带着衣物、脸盆、桶等“嫁妆”就这样嫁到他们家,中午的时候丈夫家摆了一桌菜,“宴请”亲友,办理了结婚证,这样我们就算结婚了。

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,不得不简单操作,低调进行。1964年12月19日上海《青年报》报道,上海市儿童医院陆续有两个女青年结婚。在结婚的当天,一个新娘身穿紧身的连衫裙,唇涂口红;另一个新娘则耳环垂肩,项套锁片,戴着白纱镂空手套的手,还添上一只手镯。由于这两个新娘的打扮较为突出,在青年中间引起了议论。

1936年,日本退伍军官、财阀小岛和三郎,在天津第四区小孙庄靠近周公祠的盐坨地老闸口一带的200余亩地上,画线上桩,建起四五间厂房,装备了百余台日本制造的旧机器,招募200多名工人,挂起了“昌和工厂”的牌子。这家工厂生产自行车车架、车圈、前叉、曲柄、轮盘、泥板、三套轴等自行车主要零部件。然后,加

上从日本运来的零件,组装成26英寸深绿色自行车,取名“铁锚”牌。小岛和三郎的“昌和工厂”每月生产900辆这样的自行车,这也是在中国出现的最早最大的自行车厂。

1949年1月天津解放之后,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处派人接管了“昌和工厂”,暂定名为“军管天津机器第二分厂”,直属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。1949年1月底,工厂全面复工。2月份开始正式生产自行车,并由政府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生产经费。

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,该厂被正式命名为“天津自行车厂”。1950年4月,天津自行车厂开展了“造新中国一代坚固、耐用、美观、轻快的自行车”活动,二十多名工人自愿组成了试制组,他们借来绘图用具,用木板当图板,解剖分析了荷兰飞利浦、日本堀井和英国凤头等各国名牌车,取其所长、避其所短,经过合理改进,反复筛选,又综合了来自群众的上百条建议,最后制订出造新车的方案。

“二八大杠”也是飞鸽牌自行车最早的特有型号,指28英寸的自行车,车架杠子可以坐人、放东西。特别适合三口之家前面坐孩子,后面坐媳妇。